

十年政大教育研究所所務偶憶

劉 真

就個人的興趣而言，「教書」是我最喜愛的工作。可是自從由日本留學回國以來，真正單純教書的時間，可以說極為短暫。抗戰期中在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服務時，到校授課不久，即兼任訓導工作。其後很多年，一直負責教育行政方面的責任。由於行政業務頭緒紛繁，尤以處理有關人事與經費問題，困擾最多。故凡擔任行政主管較久者，大都對此類工作，感覺厭倦。

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我交卸台灣省教育廳職務後，國立政治大學劉校長季洪先生，即堅邀至政大教書。我在當年十二月二日的日記中有一段說：

「下午七時由台中乘火車返抵台北。適季洪、仲殷兩先生伉儷在余家相候，謂擬約余至政大教書。余稍加考慮，即表示願先擔任兼任教授，一學期後，如余自覺尚可勉強應付，下期再改為專任。因余從事行政工作過久，學殖荒落，何敢誤人子弟。憶余昔年在日本求學時，即矢志以研究、教學、寫作三者為余終身致力之所在。而此三者唯有在大學教書可以同時兼顧。蓋必從事研究始可充實

教學之內容，而課室教學之內容經寫成專文或著作後，更可使之系統化，有助於以後課室之教學。故讀書、教書、寫書三者，不僅並行不悖，而且相輔相成。梁任公氏嘗言教育為自利利他之事，余則謂教學相長，自利更先於利他，實乃人生之一種最佳職業。天下之事，欲求「自利而同時利他者實屬不可多得。老子有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此唯教學一事庶幾近之。歲月蹉跎，余自日返國已廿餘年矣，今始宿願獲償，寧不慶幸！」（見拙著「辦學與從政」第六七七面）

我因過去深以行政工作為苦，所以當時特別向劉校長言明：到政大後，只教幾門功課，決不擔任行政職務。季洪先生立即慨然承諾，並笑謂仲殷先生可予保證。故在接受政大教育研究所的專任教授聘書以後，我以為從此便可過一段清靜安閒的教書生活了。

二

從民國五十三年春季開始，我便在政大教育研究所和教育系授課。當時研究所所長是吳兆棠先生，系主任是胡秉正先生。不久吳所長奉政府

徵召，就任台省教育廳長。所遺所長職務，遂由胡主任兼任。一年後，胡主任以系務甚忙，不願兼任所長，劉校長乃再三與我相商，要我承乏研究所所長職務。我因劉校長曾有諾言在先，正好作為我推辭此一職務的藉口。可是當聘書幾次送來送還以後，我終於在季洪先生以道義和感情相責之下，不得不負起教育研究所所務行政的責任。就這樣從五十三年八月到六十三年七月，我竟然擔任所長職務達十年之久，這真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我對於政府遷台後的高等教育，向來主張應採取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大學的研究所，更須力求嚴格。所以我在師大創辦國文、英語和教育三個研究所時，最初每所僅招收兩三個研究生。就我當時的想法，大學設立研究所的主要目的，一是對真正具有研究學術興趣和能力的青年，予以在國內大學深造的機會，進而謀求國家學術的獨立。二是考選各大學本科最優秀的畢業生，繼續接受學術方面的專精教育，作為未來大專師資的儲備。因而我認為研究所招收學生，一定要符合寧缺勿濫的原則。同時對研究生的要求，也應與對本科學生有所不同。

政大教育研究所的成立，遲於師大教育研究

所。民國四十三年由陳雪屏先生負責籌設，並主持所務。最初數屆招收的研究生，幾乎全部都是師大畢業的。據我在政大教育研究所授課一年多多的瞭解，一般研究生的水準是相當高的。不過為希望他們能在學術上有卓越的成就，達到政府辦理研究所的目的，我在五十三年秋季開課時，特約集研究所的全體同學，向他們說明我個人的幾點意見：

(一) 研究所一方面要採取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一方面亦應發揚中國的書院講學精神。我雖然承之所長的職務，但完全抱着與大家「共學」的態度，自視為大家的「學友」。中古時期歐洲的所謂大學，並無嚴格的「教授」與「學生」的區分。有人在某一門學問方面，可能居於學生的地位，但在另一門學問方面，如果確有研究，就又可以主持講演，變為教授的身分。韓愈在「師說」中曾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我忝為研究所的教授，個人的心情確係如此。

(二) 本所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同學獨立研究學問的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希望大家將來能成為精通教育理論的專家與熟諳教育實務的學者。此項教育目標，看來似嫌過高。不過作為一個教育研究所的學生，如果真正具有偉大的教育理想和獻身教育事業的抱負，自應下定決心，努力以赴。過去教育界有一種為人詬病的現象，就是若干所謂教育專家往往僅具備實際工作的經驗，却缺乏教育理論的素養。同樣有些所謂教育學者

動輒高談教育的理論，但又昧於當前教育的實況。(即美國俚語所謂之 *Big Head*，通常譯為書呆子或理想主義者。) 所以教育研究所的學生，必須對理論與實際同樣加以重視。將來倘有機會主持教育行政，則有關教育政策或設施的決定，才能做到「在理論上站得住，在事實上行得通」的地步。

(三) 「教育」在今天，固然已被公認為一種獨立的社會科學，但教育方面的實際問題，則牽涉甚廣。故從事教育研究者，必須在教育學科以外，盡量閱讀其他方面的書籍。譬如倫對經濟和法律等有相當的瞭解，便可在研討教育經費問題與教育法令問題時，提出比較深入和客觀的看法。因為若僅在教育專門學科範圍內兜圈子，(如只知讀「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等。其結果可能對於所專的問題雖知道很多，而對於其所不專的問題却知道很少。西方常稱所謂專家，乃係「對越小越小的事知道越多越多的人」) (*specialist is the man who knows more and more of less and less* 知道少少之中多多的人。) 故就處理一般社會問題而言，專家中的通才最為重要。因一般社會問題以及有關教育問題，與專門的特殊的科技問題不同。必須理論與實際結合，專門知識與普通常識溝通，始能洞觀全局，把握要領。

(四) 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莫不與其民族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教育不僅是文化內

涵的一部份；而且也是文化所賴以延續與創新的動力。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如果要想對中華民族文化，確實負起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責任，就不能不在傳統文化所寄託的古代經典方面下一點研究的功夫。所以希望研究所的同學不僅要努力吸收西方教育學術的新知，而且亦應同時多多閱讀涵蘊我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各種典籍。尤其我們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特別重視教育的國家，在各類文獻中，有關論及教育理論與方法的資料至為豐富。而歷代偉大教育家崇高的志節與風範，更足為準備從事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五) 一個人學問的成就，完全靠自己不斷地努力。佛家常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古今中外自學成功的學人，真是不勝枚舉。關於治學的方法，就個人多年體察所得，我以為最好能做到「疑」、「問」、「思」、「化」四個字。所謂「疑」，就是研究任何一門學問，必須具有懷疑的精神，始能不為以往的「成見」所囿，而有所創新。所謂「問」，就是對一項問題發生懷疑之後，便應進一步追根究柢，問個明白。(中文將「學」一「問」兩字綴為一辭，實涵有深義。西文很難作適當翻譯。) 一個人必須勇於發問，善於發問，然後所學方能日有進益。所謂「思」，就是將所懷疑的事物，向各方面請教詢問及查考有關資料以後，即應運用邏輯的思考法則，加以深入研究。這樣才能辨別是非，知所取捨，充分發揮批判的科學的精

神。所謂「化」，就是在治學的過程中，經過「疑」、「問」、「思」三個步驟之後，對所研究的問題，便可融會貫通，加以徹底消化。並進而將吸收於他人者化為自己的部份，以充實和擴增個人學術的成就。否則，如果囫圇吞棗，食而不化，那一定會有所偏蔽，貽害無窮。在學術上，「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樣是有很大流弊的。

(六)「大學」一書曾言：「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一個人如果真正有志研究學問，一定先要能「靜下心來」用功讀書。多年以前的大學學生，大都愛靜而不愛動，以致受到「讀死書」或「死讀書」的批評，這自然是過去大學教育一種很大的缺點。不過反過來說，一個青年進了大學以後，倘只知忙於外務，不肯安心讀書，那又怎會在學業方面有所成就？所以我希望研究所的同學，最好能做到「動」、「靜」適度的地步，不僅對「研究」工作要多下功夫，而且亦應注意於個人日常生活的調節與精神的修養。

(七)我國古代稱文字之學為「小學」，意謂兒童入學之始即應接受文字的教育。使能對中國文字的形、聲、義具有基本的了解，藉便研讀中國古代的經典。今日的情形，更與往昔不同。一個真正有志研究學問的人，不單要精通本國的文字，更應研習外國的語文，因為政治雖有國界，而學術則無國界。在今日國際文化交流日趨密切的時代，學術方面的

任何成就已為世界人類共同的業績。我們必須通曉外文，始能吸取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不過就作為一個中國的教育工作者而言，國文實較外文更為重要。無論從事教學、研究乃至行政工作，倘若國文方面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太差，將如何弘揚民族的文化？編寫優良的教材？批辦政府的文書？以往在大學教書的教授，只要有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刊行問世，縱使其本人早已作古，但仍然會受到下一代學人的敬重，真是教澤永垂，雖死猶生。我常說：「文章千古事，富貴一陣風。」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希望研究所的同學，要特別努力培養個人寫作的 ability。

(八)政治大學設立的目的，原以為國家培養行政幹部為主。故教育研究所的同學，將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機會可能很多。不過若干同學初自學校畢業時，往往對行政工作不感興趣，認為行政工作比較煩瑣。同時又由於看到很多行政人員因公結怨與是非莫辨的事實，更視行政工作為畏途。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擔任行政工作便是「做官」，「做官」就不夠「清高」。其實這種觀念，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今天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時代，無論擔任行政首長或普通公務人員，皆係民眾的公僕，以推行政令造福社會為職責。何況就理論而言，「做官」亦屬發展個人抱負最有效果的途徑。孔子是我國的先聖先師，一生周遊列國，為宣揚其政治理想而奔走，並曾在魯國攝行相事。可見中國古代的聖賢，是

抱定「可以仕則仕」的態度的。在中國歷史上，一般具有高尚志節的讀書人，像諸葛亮在野時則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當政時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如左宗棠未出任以前，曾於家塾自題一聯云：「一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他們所表現的襟懷器度，何等令人景仰。而近代我國一位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其一生的出處進退，更可作為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榜樣。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我認為我們研究教育的人，均應以此為個人進德修業的準則。

三

為使研究所的教育能兼顧理論與實際兩方面，並避免與師大教育研究所的教學重點有所重複，我於負責所務行政後，即邀請本所任課教授吳南軒、胡秉正、胡一貫、王文俊、劉錫恭、程法泌、呂俊甫、蔡保田、梁尚勇諸先生，對本所今後教育實施，加以慎重研究。當經商定教育內容及實施方式，大體分為以下四方面先行試辦：

甲、課程講授

研究所的課程分為「共同必修」、「分組選修」及「共同選修」三類，其科目名稱與學分如後：

- (一)共同必修科目：
 - (1)三民主義哲學基礎 2
 - (2)教育研究法 2
 - (3)教育哲學研究 2
 - (4)教育心理研究 2
 - (5)教育行政研究 2

(二)分組選修科目：

哲學(思想)類 凡以哲學或教育思想方面問題為碩士論文題目者，至少應選本組所列科目六學分。

(1)孔孟思想研究

2-4

(2)文化教育學

2

(3)教育學家研究

2

(4)杜威哲學研究

2

(5)近代教育思潮

2

(6)近百年中國教育思想與實施

2

心理學類 凡以心理方面問題為碩士論文題目者，至少應選本組所列科目六學分。

(1)人格心理學

2

(2)學習心理學

2

(3)精神分析學

2

(4)測驗與分析

2

(5)測驗編製

2

(6)高級教育統計

4

行政類 凡以行政方面問題為碩士論文題目者，至少應選本組所列科目六學分。

(1)中國教育問題

2

(2)課程研究

2

(3)訓導問題研究

2

(4)校舍建築之理論與實際

2

(5)學校調查

2

(6)高級教育統計

4

(三)共同選修科目：

(1)研究方法論

2

(2)比較教育研究

2

(3)現代社會問題

2

(4)近代心理學史

2

(5)心理衛生研究

2

(6)行為科學研究

2

(7)社會心理研究

2

(8)教育專著研讀

2-4

上項科目表旋即提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開始實施。

乙、學術講演

研究所所開設的各項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大都限於教育專業的範圍。可是我一向認為研究教育的人，應該具備廣泛的學術基礎，尤其對其他有關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以及當前教育的實際問題，必須有所瞭解與認知。因此，研究所除正式的課程教授以外，每週特舉行學術講演一次，以擴大同學知識的領域，提高同學研究的興趣。

大體說來，此項學術講演的主題，可分為兩部份：一部份係與教育學科直接有關者：如劉季洪先生所講之「我國大學研究所的發展」、楊克功先生所講之「同光時代的教育思想」、陳雲屏先生所講之「學習理論探討」、鄭通和先生所講之「歐美教育考察觀感」、沈亦珍先生所講之「中等教育發展趨勢」、賈馥老先生所講之「教育研究方法上的幾個問題」等。另一部份係屬於一般經濟政治法律問題者：如劉大中先生所講之「經濟發展與教育投資」、費驊先生所講之「經濟發展問題」、張研田先生所講之「臺灣人口與教育發展問題」、程天放先生所講之「政治與教育」

、查良鑑先生所講之「法律與教育」等。此外，為使同學對自然科學技術能有概括的認識，並曾約請一些著名的學者專家蒞所講演，如徐賢修先生所講之「科學教育與科學研究應採取之途徑」、鄭振華先生所講之「我國原子能發展與教育問題」等，均使同學感到極大的興趣。

總計在我負責所務期間，本所舉行的學術講演不下一百餘次。這種學術講演不僅有助於同學們知識的增進與充實；而且一般同學於聆聽很多學者專家講演以後，便和這些學者專家建立了一種學術上的關係。至於我個人，由於每次都參加聽講，可以說真正獲得了與本所研究生「共學」的益處。

丙、專題討論

本所舉行「專題討論」(相當於外國所謂之 seminar)的目的，在使一般同學對各項教育實務多所瞭解。專題討論進行的方式，是邀請各級教育主管蒞所講述當前教育實際問題並主持討論，同學可自由發問，由講述者予以解答，或相互研討。計先後應邀作專題講述者，有朱雁森先生講述「當前教育行政重要問題」、潘振球先生講述「台灣省九年國民教育之籌劃與實施」、許智偉先生講述「台灣省教育行政上的幾個問題」、高銘輝先生講述「台北市教育行政上的幾個問題」、唐智先生講述「當前職業教育問題」等。這種專題討論一方面可使同學們瞭解各項教育的實況並產生對解決教育問題的「參與感」；另一方面教育負責當局也從而獲知青年人對一般教育問題的看法，可以說充分發揮了「意見溝通」的

作用，促進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此外，為適應一部份研究生將來出國進修的需要，本所曾以「留學生生活的體驗」作為專題，約請一些回國不久的青年教授來所作一系列的講演，並解答同學們所提出的問題。李鍾桂、梁尚勇、郭為藩、林清江、施智謀諸先生均應邀講述留學歐美各國的情形。這種最為一般青年所關切的專題的討論，自易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

丁、寫作指導

大學研究所教育的任務，原以指導學生從事學術研究為主。可是以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寫作能力的培養，却仍有其必要。因此本所特經常約請一些以文章名世的學人和作家，對同學講述有關如何寫作的問題。例如陶希聖先生曾講「作文的方法」，趙友培先生曾講「文藝與教育」，孫如陵先生曾講「寫作與投稿」。我常告訴同學：學問比學位更重要。而學問的表現，則在於著作。(如傅孟貢羅志希兩先生雖未在外國取得博士學位，但因各有著作傳世，至今仍為學術界所推重。當然學術界亦不乏學問極好而未刊行著作的學人。)我國近代著名學人王國維氏曾謂：「著述家對世人的影響，常較政治家更為久遠。因政治家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毀之；但古今之著述家苟其著述一日在，則其遺澤可及於千百世而不泯。」我想王氏這種特別重視著作的議論，也許多少含有勉勵其學生努力寫作的意思。(因學術與政治實不易作輕重之分。)

報載美國加州大學教育學院的傑米格萊教授，鑒於美國一般中學與大學學生普遍缺乏寫作能

力，因而發表專文，強調寫作能力的重要。他認為寫作能力的培養，是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不加強個人的寫作能力，即無法加強教育對個人的效能，而寫作能力的喪失，實無異於受教育能力的喪失。我常以報紙上這段資料，來喚起同學們對寫作能力的重視。

為鼓勵同學勤於寫作，規定每一科目均須按時繳送研究報告。我所講授的兩門課程，通常均係以研究報告代替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對各同學所寫的研究報告，我細心看過以後，常和他們交換關於文章的題目、內容、結構和修辭方面的意見。我更希望他們將自認為滿意的文章，向各報紙和雜誌投稿。如果在學生時期發表了一些優良的作品或有學術性的著作出版，則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將會很容易獲得解決。因為社會上有些人認為一本好的著作比一張學位文憑，更具有實質的價值。

四

歐洲一些古老的大學，大都採取講座制度。我國因歷史背景與客觀條件不同，一般公私立大學很少設有固定的講座教授。不過為培養研究風氣，提高學術水準，大學各院系尤其研究所，似有參照歐洲大學講座制度的精神，延聘學術界的大師宿儒及對某一方面造詣卓越的專家作為臨時講座的必要。

民國五十六年錢賓四(穆)先生自香港回國定居，報載其曾向記者公開表示，以年事漸高，決定退出講壇，專心著述。故各大學教聘其擔任

教授時，均為婉辭。我於獲悉賓四先生在北平金山街之寓所後，即專誠往訪。經再三懇商，承允擔任一個學期的專題講座，主講「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

錢先生在中國教育制度方面，自三代以迄明清，就中央與地方、官學與私學等的沿革與特徵，加以貫通的解說與比較。在教育思想方面，則由先秦諸子至宋明大儒，並包括儒、道、墨、佛各派對教育的看法與影響，作了精闢的分析與批評。此一講演記錄印成專冊後，各方索閱者頗多。

政大一般同學因久慕錢先生的大名，故賓四先生在教育研究所講課時，其他各院系學生亦常前來旁聽，乃不得不利用較大教室上課。賓四先生每次至政大講演，我均乘車親自接送，途中並可藉機交換有關文教問題的意見，彼此精神均感愉快。當時台北聯合報的于衡先生，曾在其所撰寫的「台北外記」中，談及賓四先生之所以破例至政大講課，主要是由於他和我私人之間的一段友誼。因賓四先生民國三十九年第一次回國講學，乃係應師院的禮聘。現在我擔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既再三約請其至研究所作短期講學，自不便推辭。于君為新聞界的名記者，也係我在師大時所聘的兼任教授(社教系新聞組)，如果他的這段報導，確屬他個人訪問賓四先生的紀實，那我對賓四先生真應深表謝意了。

儒家學說為中國教育思想的主流，亦係民族傳統文化精粹之所在。所以在陳百年(大齊)先生辭去政大校長職務後，我即要求他為教育研究

所新開一門「儒家教育思想」的專題講座。經我一再的懇商，他當即很委婉地向我說，儒家的範圍很廣泛，他對宋明理學（亦即所謂新儒學）未下過很深的功夫，不便講述。最好把講題範圍縮小一點，改為「孔孟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所當然遵從百年先生的意見，將講題改變一下。後來百年先生發表的「孔子教育思想」和「孟子教育思想」兩篇大作，便是當時在教育研究所的講稿。

百年先生的道德學問，士林共仰。經師人師，備於一身。而他對儒家學說思想研究的精湛，更素為學術界所推重。（曾有多種專著出版）可是他每次講課之前，總充分準備，寫成講稿。我乘車接他至研究所授課時，他常在車中將講稿見示，並告以所講要點。百年先生治學的謹嚴和態度的謙虛，使我永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教育係一種精神事業，與社會一般行業不同。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僅須有深厚的學術基礎，而且更應具備崇高的精神修養。因此，除上述由錢賓四和陳百年先生所主持的兩項學術講座以外，政大教育研究所又開設了名為「宗教哲學」的講座。為使政大同學及社會人士對此一講座的的目的有所了解，我特寫了「舉辦宗教哲學專題講座的旨趣」一文，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其中有幾段說：

「教育研究所計劃從本學期起，在一般性的學術專題講演以外，開始舉行一系列的「宗教哲學」方面的專題講座。就今日對社會影響力較大的各種宗教，敦請大家平素所最敬

佩的宗教家或富有研究的學者，作若干次專題講演。我並非要研究所的同學將來成為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只是希望各同學在聽過講演之後，對其立身治學能獲得在一般學問中不易獲得的啓示和見解。」

「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自係以儒家思想為基幹。而儒家思想中之天人合一觀念，何嘗與宗教思想沒有相通之處？故有些國家常視我們的儒學為儒教，而我國古代大儒，其傳道、弘道，乃至殉道的精神志節，亦可與若干宗教家相媲美。宋代理學家二程兄弟向周濂溪問學時，濂溪所言甚少，僅勉以應「尋孔顏樂處」。我們細細品味此寥寥數字，含蓄着何等恢廓坦蕩超然物外的境界！這豈是一般僅僅記誦章句如今日之徒知致力於書本知識者所能企望於萬一？所以我常以為：我們中國古代的一些大儒，他們本身也許沒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但是他們的立身行事，却於無形中表現了宗教家那種崇高的人格與獻身的精神。我國已故的黨國先進趙次隴先生生前自謂：『志佛家之所志，行儒者之所行。』這兩句話，頗可表現我國過去一部份前輩的知識分子思想生活所特有的風格。」

「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舉辦『宗教哲學』的專題講座，也許有點不合時宜；甚至談宗教、談哲學，亦可能被認為空疏迂闊，不切實際。實則科學與宗教，乃是相輔相成的。記得民國四十二年六月我參觀美國普林斯頓高級學術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時，經董世綱先生介紹，曾晤及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氏。我因不久前看到他在一位記者討論宗教與科學的問題，所以也特別以此問題向他請教。他當即表示宗教與科學不但不相衝突，而且密切關聯。他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我覺得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頗有獨到的地方。至於哲學與人生的關係，西洋古代羅馬大作家西塞羅（Cicero）說得最好，他說：『哲學，人生之導師，至善之良友，罪惡之勁敵！假如沒有你，人生又值得什麼？』我們如果冷靜地想一想，古往今來的那一位偉大的人物，不具備宗教的熱忱與哲學的修養呢？」

「宗教熱忱和哲學修養，我認為乃是一個教育家所必備的條件。我希望這一系列的『宗教哲學』專題講座，除給予教育研究所同學們一些寶貴知識外，更能引導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中，進入一段新的里程，達到更高的境界。對所謂『現象世界』的一切，看得更為超脫。不斤斤於物質的享受，不戀戀於世俗的浮華，樂道自得，立己立人。果能如此，則你們未來的成就，將不止是僅僅具有豐富知識的專家或學者；而且更是充滿愛心與熱忱能夠真正實踐中國傳統師道的教育家。」

我的這篇文章在報上發表以後，「宗教哲學」的專題講座即開始舉行。當時應邀的講演人與講題為：

中國儒家學說與天主教教義 蔣復璁

天主教的精神

漫談基督教

基督教與教育

佛學與中國歷史文化的因緣

佛學內容簡介

道教與中國文化

伊斯蘭與人生

以上各篇講稿經整理後，轉為「宗教與教育」一書，由研究所出版。也許由於現代社會畸形發展的結果（物質與精神失去平衡），很多人都感到心靈的空虛與苦悶。當研究所每次舉行「宗教哲學」專題講演時，一般同學及校外人士參加聽講的人，極為踴躍。所以我又商得南懷瑾先生的同意，從五十六年秋到五十七年春，另行講述「道佛兩家學術思想與中國文化」，其講演主要綱目為：

佛學與中國文化

禪宗概要

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文化教育的精神

道家學術思想與黃、老、老莊的淵源

隱士思想與道家

方士的學術與道家

道家與道教學術思想的內容

漢魏以後的神仙丹道派

道家與道教宗祖人物思想的略論

道教

道家及道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教育精神

懷瑾先生此一專題講演內容極為豐富，台北大華晚報曾予披露一部份，惟各方索閱全文者甚

羅光

曾約農

張繼忠

南懷瑾

南懷瑾

南懷瑾

石梁三

多。立法委員楊管北先生篤信佛學，乃自動出資印成專書，並由懷瑾先生將書名定為「佛敎禪宗、道教道家與中國文化」。楊管北先生於所撰之本書跋語中有云：

「去秋今春，先生應劉白如兄之邀，在政大教育研究所，講演佛道兩家與中國文化。又經大華晚報披露一部分講辭，讀者咸欲竟其全文，乃發心隨喜，為之經募印送三千冊，用以宏揚中國文化與佛法之勝緣。」

「宗教哲學」這項專題講座，竟引起社會人士的濃厚興趣與熱誠贊助，實為當初舉辦時所預想不到的。

五

在台北木柵政大校區內，教育部建有檔案室一所，其中皮藏很多足供研究參考的教育史料。有一天劉校長偶爾和我談及，並告以似可商請教育部給予政大教育研究所同仁查閱的便利，或在不妨礙文書保密的原則下，允許抄錄所需資料，作一有系統的整理。季洪先生的此一提示，引起研究所同仁很大的興趣。於是便商得教育部的同意，開始進行抄錄整理的工作。

我們從教育部的舊檔中，看到了很多自清末實施新教育以來的重要資料。研究所同仁們認為如以這些第一手的資料為主，再參閱其他有關文獻，便可編撰一套頗具價值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為使此一工作能順利進行，特擬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編著計劃」，並提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其內容

包括以下各項：

(一)目的：根據政府檔案及有關文獻編著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若干種，以供本所同仁、同學及社會各界研究參考。

(二)類別：

(1)近代中國教育家傳記

(2)近代中國教育制度

(3)近代中國教育思想

(四)範圍：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之編纂，暫以清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二—一九四五）之史料為範圍。

四人員：

(1)主持者：由本校教育研究所所長兼任

(2)編著者：由主持者就本校教育所、系教授暨教育研究所畢業留校任教校友中遴聘四人至六人擔任之。

(3)資料抄錄及攝影人員：由主持者斟酌實際需要選用之。

(四)資料蒐集：分赴南港中央研究院、國史館、黨史會、國立中央圖書館、教育部檔案室及各書局蒐集有關資料（包括官報、文牘、公報及私人專集等文獻之抄錄；手稿、圖片、翰墨等之攝影或複印）。

(五)編撰方式：

(1)分類考訂：由各編著人將所蒐集之資料加以整理分類，遇有遺誤者則考訂補正之。

(2)座談研究：遇有疑難問題，則舉行座談會討論研究，或向有關專家學者徵詢意見。

(3)試編初稿：初稿綱目及內容之編排，由主

持人約集各編撰人會商決定，必要時得送請專家提示意見。

(4) 文稿審查：各項史料及著作之初稿完成後，一律由本所送請專家加以審查。

(出版：

(1) 由教育研究所參照本校叢書出版辦法，接洽適當書局辦理。

(2) 出版之著作，其規格、形式，力求劃一，並一律冠以本校教育研究所「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字樣，其版權仍歸編著人所共有。

(3) 本所歷年研究生畢業論文如有適合本計劃範圍且內容豐富者，亦可經審查後由本所協助出版，列為此項叢刊之一。其版權仍歸編著人所有，不另支給稿酬。

上項計劃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本所同仁即依個人興趣，分別進行資料的整理與編撰工作。並決定先選幾位對近代中國教育具有卓越貢獻的教育家，為他們撰寫傳記。因為我們覺得教育事業的成敗，人的因素關係甚大。而這些已經逝世的教育家所樹立的偉大風範，對目前和將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一定會產生見賢思齊的鼓舞作用。

同時，在目前政府教育經費極感困難的情況之下，提倡私人興學實為事實所必需。但為避免私人興學可能發生的流弊，（如防止私立學校成為學店）最好把過去辦理私立學校卓著聲譽的教育先進的生平，分別寫成傳記先行出版，使今日在臺灣辦理私立學校者知所取法。於是我們便選

定了創辦天津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先生和創辦湖南明德中學的胡元倬先生，由孫彥民與黃中兩位校友分任撰寫之責。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張伯苓先生傳與胡元倬先生傳即相繼在中華書局出版。

至於在教育政策與制度方面，今日政府和社會所極關切者可能是華僑教育與留學教育，所以我們便儘先着手整理這兩類的資料。朱敬先校友在蔡保田教授指導協助之下，很快即撰就「華僑教育」一書，仍交由中華書局出版。王煥琛教授負責編寫的「留學教育」，因牽涉範圍甚廣，問題亦較複雜，為力求內容完備正確，不能不多方蒐集資料，及訪問留學前輩，歷時數載，始行定稿。全書計約八十萬字，已與國立編譯館訂約，近期即可刊行問世。

此外有關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中學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及國民教育等部份，原已約定之撰稿人由於調職或出國，致無法如期交稿。我想今後教育研究所各同仁，當會樂於繼續完成此項計劃的。

六

無可諱言的，現在一般人總覺得只有歐美各國的教育才是最進步的教育，因而也以為只有採行歐美的教育才是一種最正確的途徑。可是在我個人看來，却並不完全如此。固然歐美各國在教育方法上，因為利用科學技術的最新工具，可以發揮很大的效能。但也正由於受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影響，過度信賴數量的、分析的研究結果，忽略了教育活動本身的特色，陷入機械唯物的

窠臼。殊不知教育是一種「人性」的「自覺」的工作，其對象並非同於一般的物質或其他的動物，教育的研究應着重於從統整的、價值的方面，瞭解人性，因材施教，充分發揮師生之間精神上的交感作用。

因此，中國數千年來，在教育方面，特別重視「師道」。自古君師並尊，學術上的導師與政治上的領袖受到社會同等的敬重。不僅身為師傅的大臣對天子講學時，不必北面居於臣位；即帝王時代的儲君，對其業師也常侍立聽講。荀子大略篇云：「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即放肆而輕法度之意），人有快則法度壞。」所以尊師重道乃是中國文化最優良的傳統，亦為古代書院講學基本精神之所在。

西方國家最初視教師如僕役（如希臘時代係以奴隸充任小學教師），現則對待學校教師和對待一般勞工一樣，甚少尊敬之意。因而教師亦如其他勞工，常為爭取待遇而罷工。至於師生之間，儼如路人，遂致原為研究學術的學府，逐漸變為買賣知識的市場。影響所及，自然使社會上重利輕義，富而不安。而近年美國一般中小學學風之敗壞，論者多謂主要由於教師缺乏專業的道德。（可參閱拙著清白集所載「美國全國教育協會第一二三屆年會記要」一文。）故歐美若干教育界人士在中國參觀訪問後，大都表示中國此種尊師重道之傳統精神，值得西方國家特別重視。美國加州近曾建議亦以孔子誕辰定為該國的教師節，當係受中國此一傳統教育精神的影響。

我個人自國內大學畢業後，即至國外留學，並曾奉派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教育多次，可以說過去所接受的大部份是新式的西方的教育。不過就自己多年體察所及，深感我們對西方外來文化應「擇善而從」，不能「盲目接納」。（當然亦不應全面排斥。）對我國傳統文化應「擇善固執」，不能「妄自唾棄」。（當然亦不應故步自封。）

譬如就當前教育政策而言，自須積極加強科學教育與研究工作，期能迎頭趕上歐美科學發達的國家。同時在教育方法上，當然也應採用歐美各國的新式設備與技術，加以不斷改進。可是我們教育方面若干最優良的傳統精神，不但要予以重視，而且更須繼續發揚光大。我多年來即認為欲謀教育的革新進步，必先弘揚中國傳統的師道，故在師大和教育廳服務期間，特別以此與師大同學及全省教育界同仁相勉。並曾發表「中國的師道」「師道與德行」等專文，（均見拙著「辦學與從政」一書）藉期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當然，我們都會承認：今日的客觀環境，已與往昔大不相同。在瀰漫着功利思想和崇洋心理的社會中，要想重振中國傳統的師道，真是談何容易。不過我總覺得作為大學教育研究所的師生，理應抱「起衰振弊」的宏願，作「盡其在我」的努力。因此，我在主持政大教育研究所期間，便經常與師大、政大教育所、系及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對於此二問題相互交換意見。最後決定由我約集大家共同合作撰寫一書，名之曰「師道」。我們主要的動機，就是想把中外許多足以為人師表的聖哲和先進的生平事蹟與獨特風範，

作一種扼要而平實的介紹，使目前正在學校服務的教師以及準備從事教育工作的青年，能夠見賢思齊，當仁不讓。並從這本書裡，對於「為師之道」，獲得若干啓示。因為我們覺得：這種具體的範例，當較空洞的說教，更易產生激勵的作用。

在編寫這本「師道」的過程中，各撰稿人曾舉行多次的座談。其中關於選擇對象的標準問題，最初大家便有不同的意見。例如耶穌基督是否可以列為偉大的教師編入本書，幾位身為教徒的撰稿人便堅決主張列入，而教外的撰稿人則持相反的看法。我個人雖非教徒，但我向來主張教育工作者應具備宗教家的精神。尤其民國五十七年秋訪問耶路撒冷期間，我曾參觀多處耶穌生前的聖蹟。就我所知，耶穌三十歲開始佈道，三十三歲即被釘死於十字架。就傳道的時間言僅有三年；就傳道的地區言僅限於巴勒斯坦一帶。而最後竟被其少數的門徒之一出賣，乃致以身殉道。所以我在與一位希伯來大學教授餐敘時，曾很坦率地向他請教：像耶穌基督這樣一生的經歷，何以能對世界人類產生如此久遠的影響？當時這位希伯來大學教授也沒有對我作正面的肯定的解答。（基督徒的解釋為耶穌係天主之子，是人又是神。）不過從耶穌在世時所表現的身教言教的事實和精神來看，實與孔子及蘇格拉底同樣樹立了偉大教師的典型。（耶穌在世時，其門徒即尊稱其為師父。）經我向大家陳述這一點後，各撰稿人亦即未再表示異議。至於其他有關撰寫方面的問題，自然還有很多。但因大家只有一個共同

的動機，所以一切進行極為順利。

這本「師道」所包括的中外足以為人師表的人物，共計五十一位。（中國部份以已逝世者為限。）其中中國部份計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鄭玄、韓愈、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陳白沙、王守仁、孫奇逢、顧炎武、顏元、李斌、王筠、馬良、蔡元培、張伯苓、梅贻琦、胡適、傅斯年、胡元倬……等三十二人。外國部份計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耶穌基督、柯美紐斯、洛克、康德、裴斯塔洛齊、非希特、赫爾巴特、福祿貝爾、斯賓塞、杜威、克伯屈、斯普朗格、福澤諭吉……等二十八人。至於中外其他足以為人師表之人物雖為數尚多；惟因資料搜集不易，自難一一列入。今後當繼續增補，力求完備。

「師道」的撰稿者，有的為前輩學人，有的為年輕教授。他們肯在百忙中，參與編寫工作，可以說充分表現了一種弘道淑世的精神。他們的大名是：陳大齊、方豪、趙雅博、札奇斯欽、程法泌、賈復者、葉學志、梁尚勇、蔡保田、黃昆輝、林清江、呂俊甫、歐陽教、吳鼎、趙廣麟、張植珊、楊承彬、伍振濤、程運、鄧玉祥、黃振球、黃中、孫彥民、李正富、黃發策、高廣孚、房志榮、鄭重信、鄭瑞澤、鄭世興、李祖壽、王煥琛、徐南號、林來發、楊極東、劉潤清、馬肇選、徐宗林、李緒武、謝廣全、劉煥輝、方炳林等四十二位。其中陳百年（大齊）先生以八七高齡，竟能俯允所請，樂助其成，實在我萬分感幸。記得當我專誠至其寓所懇商為「師道」撰寫

首篇「孔子」時，他曾委婉告以因精神體力關係，業已較筆甚久。日前某一重要文化機構屢約撰寫「中國倫理想」一文，彼即藉此理由予以推辭。及至經我再三懇切說明編寫此書的主要動機後，他始表示同意。不過他因久未寫作，手邊書籍甚少，囑檢送有關參考資料，並寬限完稿時間。（我原請其三個月內寫成。）由於百年先生予以破例撰稿，自然也就促起了其他撰稿人對編寫此書的重視。以後最出我意料之外的，就是百年先生竟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寫成長約兩萬七千字的「孔子」一文，派交專人送來，並附一函如下：

百年先生賜函及原稿一頁刊出，意即在此。
百年先生八七高齡所撰「孔子」一文原稿手跡

孔子是一位偉大的實踐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在春秋戰國之交，處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他以其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洞察力，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他提出的「仁」、「義」、「禮」、「智」、「信」等思想，不僅是當時社會的救星，也是後世中華民族的靈魂。他的學說，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在孔子身上，我們看到了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對現實的無畏批判，以及對人類的無限關懷。他的思想，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也是世界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白如先生道席：承為師道徵稿，經檢閱拙著孔子學說教育章及教研通訊所載拙文，均難滿意。茲另擬一稿，共分五節。其第一節係新撰，二、三節係重撰，第四節就孔子學說教育章之第二節作若干修改，第五節除新撰首二段外，餘則照抄教研所載原文。稿成自閱，亦不甚滿意，姑以奉呈斧正。勿此，敬頌
教安！

弟陳大齊敬啓 十月三十日
百年先生的大作，取材精審，立論平正。全文自首至尾，均係親筆抄寫，字跡清晰，極便排印。以百年先生這樣的「高齡」，這樣的「碩望」，而竟能對人如此「重然諾」，對事如此「不苟且」，真可算是當今一位最能實踐中國傳統師道的代表人物，更是我們一般現正從事以及準備從事教育工作者最佳的典範。（作者之所以特將

在上述四十多位撰稿者的通力合作之下，花費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師道」這本厚達七百六十七頁的「集體作品」，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由台灣中華書局出版。我們全體撰稿者認為：這是對該年即將到臨的教師節一種很有意義的獻禮。

我因感於政大教育研究所同學的經濟情況多不甚佳，常思設法籌集一點助學資金作為他們隨時週轉之用。所以當約稿編寫「師道」時，曾向各撰稿人言明此書出版後之版稅，全部充作政大教育研究所設置助學貸款的基金，對撰稿人將不付與稿費。及「師道」由中華書局出版後，本所即贈送撰稿人「精裝本」與「平裝本」各一冊，略表謝意，並資紀念。

就目前出版界的情形而言，專門性和學術性的著作，大都銷路較差。不意這本售價頗高的「師道」，居然在很短期間，即印行三版。這固係由於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常購此書贈予優良教師

作為獎品；同時也可看出一般社會人士對師道問題仍屬相當的重視。因而師道一書的版稅，很快便達到四、五萬元的數目。在教育研究所籌集的助學資金總額內，佔了相當大的比重。所以當我辭卸所長職務時，特將師道一書的版稅契約，正式送請政大行政當局存檔備查。這可算是我對學校「公務以外」的交代，也了却我個人一點小心願。

和民國五十三年秋開始承乏教育研究所所長職務時一樣，我於六十三年七月學期結束前，也約集本所全體同學舉行一次茶會，告以業已獲准辭去所長職務。他們知道以後，便要我說幾句話，藉示「贈言」之意。我當即表示以往十年內已經對大家講得很多，而且所講的內容有些已寫成文章公開發表。（如「教書匠與教育家」及「三自主義」等）實在再沒有什麼更好的意見，向大家貢獻。在茶會結束時，我只把兩首古人的詩句抄示他們：

一首是陶淵明的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另一首是王陽明的詩：「起向高樓撞曉鐘，向多昏睡正懵懵；縱今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我想一般研究所的同學，當可體會出我對他們在治學和為人方面的期望吧！

在我辭去研究所的行政職務以後，教育研究所的所長便相繼由葉學志、蔡保田兩兄擔任。我每週僅在所內講課數小時，開始過一種比較單純的教學和研究生活了。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於台北